

引文格式: 尹子伊, 陶建杰, 林晶珂.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民政策信息贫困测量、分解及影响因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18(6): 65-74. DOI: [10.12371/j.ynau\(s\).202407079](https://doi.org/10.12371/j.ynau(s).202407079)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民政策信息贫困测量、 分解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

尹子伊^{1,2}, 陶建杰³, 林晶珂⁴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3.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4. 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相对贫困治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步入信息化时代, 信息贫困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相对贫困类型。从多维相对贫困的视角出发, 以政策信息为切口, 设计包含认知、能力、服务、硬件 4 个维度、12 个指标的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基于中西部地区 1047 位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 采用 A-F 法完成测量并探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 信息通信设备接入层面的数字鸿沟不再是掣肘信息脱贫的主要因素, 提升基层信息服务水平是下阶段工作的重点; 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的群体和地区差异突出, 人群识别和指标突破要精准。鉴于不同因素的差异化作用机制, 为打通政策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 相对贫困; 多维贫困; 政策信息贫困; “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 F 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24) 06-0065-10

Measurement, Decomposi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Policy Information Poverty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YIN Ziyi^{1,2}, TAO Jianjie³, LIN Jingke⁴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s a crucial task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Ente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pover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ype of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nd taking policy inform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收稿日期: 2024-07-17

修回日期: 2024-09-06

基金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数字媒介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研究”(2024RC005)、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居民信息贫困的
测度、成因与治理研究”(FDJSKC23001)。

作者简介: 尹子伊(1997—), 女,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乡村传播、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



system for policy information was designed, which included four dimensions: cognition, capability, service, and hardware, comprising 12 indicator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 047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A-F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and conduct dimensional and regional decomposition, then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multidimensional policy information poverty was widespread in rural areas; the digital divide at the level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was no longer the main factor hindering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ring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the grassroots was the focus of the next stage; group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prominent, and popu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indicator breakthroughs must be precise.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ed mechanisms of various factors, this paper advance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policy communication.

Keywords: relativ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olicy information poverty; rural issues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意味着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仅要防止农民再次陷入物质贫困,还要关注他们在思想观念和发展条件上的不足。“信息贫困”是现代社会的新型贫困现象,信息作为当代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对个体在智识层面的提升至关重要。近年来,虽然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但农民获取信息服务的机会和能力仍存在不平等,阻碍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若不重视信息贫困,不仅会影响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还可能动摇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本文从多维相对贫困的视角出发,以政策信息为切口,聚焦信息贫困的测量、分解和影响因素,旨在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 多维相对贫困与信息贫困

绝对贫困思想曾长期主导贫困研究,近年来,相关研究的视角和理念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因素,开始关注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的缺陷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转向社会发展、人力资本视角^[1]。如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主张通过评估个体实现功能性活动的机会、能力和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质性自由来界定贫困^[2],权利贫困理论则指出贫困和饥荒源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而非食物短缺^[3]。相对贫困思想推动了贫困衡量标准的多维发展,不仅包括收入,也包括各种功能性指标^[4]。

除物质资源外,信息资源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可再生性特征^[5]。信息生产、分发、使用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信息分化是社会分化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延伸,表现为不同主体接触和拥有信息资源上的差距及差距不断扩大的状态^[6]。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虽然提升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效率,但也加剧了信息分化问题^[7]。

信息贫困这一概念暗含了信息的稀缺性和商品属性^[8]。前人研究从不同视角定义信息贫困:能力视角将其定义为个体缺乏进行基本信息活动的的能力^[9];行为视角认为信息贫困体现为边缘群体和特权群体在信息行为上的差距^[10];权利视角强调因缺乏获取信息机会而无法共享信息社会文明成果的状态^[11];环境视角指出信息贫困体现为媒介和通信设备的不完全普及^[12]。可见不能仅用信息资源拥有量的多寡划分信息富有与贫困,还涉及个体的信息意识、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信息渠道的畅通性以及外部信息供给等方面的表现。本文将信息贫困定义为个体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和面临的多重信息壁垒状态。

(二) 中国农村信息贫困的实证研究:路径与不足

识别和评估信息贫困对于制定有效的帮扶措施至关重要。学者们通过开发量表、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公开资料或问卷数据进行实证评测,现有研究主要从主体和环境 2 个维度开展。主体维度更关注个体的信息意识和能力,如刘若熙等通过信息意识、能力和创新潜力 3 个维度评估农民的信息素养^[13],于良芝等设计了个人信息世界

量表, 包括信息可用性、信息资源基础等 8 个维度^[14]。环境维度则侧重于信息环境对激发农民信息需求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作用, 例如刘世洪等通过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应用等 6 个维度的指标体系, 揭示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区域差异^[15]。金福子等人的农业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指出, 服务和管理信息化的滞后是信息化进程的主要瓶颈^[16]。

综上所述, 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评估是研究信息贫困的有效途径, 但仍有提升空间: 理论上, 信息贫困应与反映客观状态的信息素养、信息化水平等概念区分, 它是一个相对概念, 需通过比较个体情况与贫困标准来识别。方法上, 贫困测量应遵循特定公理, 指标设计应细化信息类型, 因为农民对政策、生产、生活、科技等不同类型信息的可及性和拥有程度存在差异。目前, 只有刘宇等人针对科技信息设计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17]。从多维贫困深入到信息多维贫困, 是对信息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现象更细致的认识, 而把握信息类型的特殊性, 则是对信息多维贫困更精准的考察。

政策信息对农民至关重要, 政策不仅是国家、政党实现目标的计划和行为准则^[18], 也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治理工具^[19]。农民对政策信息的掌握程度不仅会影响政府执行政策的效率、工作目标的实现, 也关乎农民从政策获益的程度。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农民普遍缺乏对政策信息的了解, 且各群体间的认知水平差异显著^[20]。对农政策传播不畅、受众理解存在偏误、政策信

息不对称等现象都指向同一问题——政策信息贫困, 亟待关注和解决。

二、识别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的研究路径

(一) 核心概念: 可行信息能力

“可行能力”指个体实现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贫困则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限制或剥夺^[2]。樊振佳等基于对信息效用和自由的探讨, 定义了“可行信息能力”, 即个体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实质自由和在信息行为中获取信息效用的能力^[21]。这一概念是多维贫困理论与信息贫困理论的结合点, 有助于从相对贫困视角深入理解信息贫困。

(二) 指标体系

从可行信息能力出发, 基于对农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 充分考虑代表性、可获得性、独立性等原则, 本文设计含 4 个维度、12 个指标的指标体系, 反映农民在个人与社会、内部支持与外部支持的交互作用下, 在政策信息实践中的实质性自由(表 1)。

本指标体系以政策信息为核心, 覆盖生活与生产、线上与线下的多元场景。其中, I1、I2、I3、I6、I7、I8、I9、I12 直接衡量政策信息贫困, I4、I5、I10、I11 则通过评估农民的综合信息能力和所处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间接反映他们获取政策信息的潜力。认知和能力维度代表内部支持, 指向农民获取和理解政策信息的能动性, 是主体贫困的体现。服务和硬件维度则代表外部支持, 反映外部环境提供政策信息资源的可能

表 1 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 维度 | 指标 | 定义和临界值 | 权重 |
|----|-------------|---|------|
| 认知 | I1.综合类政策认知 | 对惠农政策的总体了解程度, 无法或难以理解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2.生产类政策认知 | 对生产类政策的了解程度, 无法或难以理解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3.生活类政策认知 | 对生活类政策的了解程度, 无法或难以理解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能力 | I4.信息渠道利用能力 | 利用多信息渠道的能力, 仅从单渠道获取信息赋值为1, 否则为0 | 1/12 |
| | I5.信息检索能力 | 通过互联网检索信息的能力, 不具备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6.网上办理政务能力 | 通过互联网办理政务服务的能力, 不具备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服务 | I7.政策人员服务 | 政策传播人员的服务情况, 未添加干部微信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8.政策社群服务 | 政策传播社群的服务情况, 未进入村政微信群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9.政策机构服务 | 周边信息机构提供政策信息服务情况, 未提供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硬件 | I10.家庭移动设备 | 户均移动电话的数量, 低于2.57部/户赋值为1, 其他为0 ^① | 1/12 |
| | I11.家庭网络设施 | 家庭接入互联网的情况, 没有接入宽带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 | I12.政策机构规模 | 村庄政策信息机构的建设情况, 无任何机构赋值为1, 其他为0 | 1/12 |

注: ①问卷收集时间为2019—2020年, 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民户均拥有移动电话2.57部^[22]。

性, 揭示环境贫困问题。

(三) 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郑素侠等在分析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社会发展测评数据后发现, 中国的信息贫困与物质贫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一致性, 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23]。这些地区农村发展相对落后, 人口外流严重, 信息化建设需求迫切。因此, 中西部省份的调研具有代表性。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 课题组在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常德市汉寿县和桃源县,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黄山市歙县,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南阳市方城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和西吉县,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 采用多阶段立意抽样法, 共回收有效问卷 1284 份, 其中 1047 份适用于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测量。样本中, 中部省区占 60.36%, 西部省区占 39.64%; 性别方面, 男性占 60.35%, 女性占 39.65%; 学历方面, 小学及以下占 19.67%, 初中占 36.82%,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占 27.03%, 大专及以上占 16.47%。

(四) 测量方法

本文采用多维贫困研究中普遍应用的“双临界值多维贫困测量法”(A-F 法)^[24], 步骤如下:

第一步, 构建观测矩阵并识别指标贫困。 $X_{n \times m}$ 为样本观测矩阵, n 为样本数, m 为指标数。 $x_{ij} \in X_{n \times m}$ 为个体 i 在指标 j 上的值($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z_j = (z_1, z_2, \dots, z_m)^T$ 为每个指标的受剥夺临界值构成的向量。当 i 在 j 上的取值 $x_{ij} < z_j$ 时, 意味着 i 在 j 上处于贫困状态。用矩阵 $g^0 = [g^0_{ij}]$ 表示 i 在各指标上是否受剥夺, 当 $x_{ij} \geq z_j$ 时 $g^0_{ij} = 0$, 当 $x_{ij} < z_j$ 时 $g^0_{ij} = 1$ 。最终观测矩阵被重新定义为元素为 0 或 1 的剥夺矩阵。

第二步, 识别信息贫困。计算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后发现, 各指标间相关性较小, 且所有指标都转换为虚拟变量, 加之 A-F 法对权重并不敏感, 最终采用等指标权重法。每个指标的权重为 w_j , 通过公式 $C_i = \sum_{j=1}^m w_j g_{ij}$ 计算 i 在所有指标上的总剥夺得分, 贫困临界值为 k , 如果 $C_i \geq k$, 则个体 i 是政策信息多维贫困者, 此时 $C_i(k) = C_i$, 如果 $C_i < k$, 说明个体 i 在临界值 k 上不是政策信息多维贫困者, 此时 $C_i(k) = 0$ 。

第三步, 计算相关指数。政策信息多维贫困发生率(H)为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总人数(q)占样本

总人数(n)的比重, $H = \frac{q}{n}$, 衡量贫困广度。平均剥夺份额(A)通过贫困样本在水平 k 上的总剥夺得分之和除以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总人数计算, $A = \frac{\sum_{i=1}^q C_i(k)}{q}$, 衡量贫困深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 M_0 是由广度与深度共同构成的综合指数, $M_0 = H \times A = \frac{q}{n} \times \frac{\sum_{i=1}^q C_i(k)}{q}$ 。

第四步, 指标和群体分解。 P_j 为指标 j 对总体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 $P_j = \frac{q_j \times w_j}{n \times M_0}$, q_j 为处于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状态的个体中, 在指标 j 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数。A-F 法还符合子群可分性公理, 可以计算各群体对总体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25]。如按个体特征将样本划分为矩阵 a 和 b , 则 $M(a, b; z) = \frac{n(a)}{n(a, b)} M(a; z) + \frac{n(b)}{n(a, b)} M(b; z)$, 以组别 a 为例, 它对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为: $P_a = \frac{n_a}{n} \times \frac{M_a(k)}{M(k)}$ 。

三、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

(一) 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

表 2 为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 其中, “网上办理政务能力”和服务维度所有指标均超过 50%, 位居前四。排名 5~10 的指标依次为“综合类政策认知”“政策机构规模”“生产类政策认知”“信息检索能力”“生活类政策认知”和“家庭移动设备”, 发生率都超过 30%。而“家庭网络设施”和“信息渠道利用能力”的发生率较低, 分别为 27.51% 和 21.01%, 反映农民在网络和信息渠道方面具有较高的可及性。

表 2 各指标贫困发生率

| 维度 | 指标 | 总体/% | 排序 |
|----|----------|-------|----|
| 认知 | 综合类政策认知 | 47.56 | 5 |
| | 生产类政策认知 | 38.68 | 7 |
| | 生活类政策认知 | 36.49 | 9 |
| 能力 | 信息渠道利用能力 | 21.01 | 12 |
| | 信息检索能力 | 38.11 | 8 |
| | 网上办理政务能力 | 79.27 | 1 |
| 服务 | 政策人员服务 | 53.30 | 4 |
| | 政策社群服务 | 58.64 | 3 |
| | 政策机构服务 | 71.63 | 2 |
| 硬件 | 家庭移动设备 | 33.14 | 10 |
| | 家庭网络设施 | 27.51 | 11 |
| | 政策机构规模 | 39.45 | 6 |

群体比较后发现，性别方面，7 个指标的发生率呈现“女高男低”的特征；婚姻方面，9 个指标呈现“未婚高于已婚”的特征；以样本均值 41.7 岁为界分为低龄组和高龄组，有 9 个指标呈现“低龄组高于高龄组”的特征，上述指标都包括认知和服务维度所有指标。

（二）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测量

本文在 k 为 0.3~0.8 的区间内测算结果，分为轻度(0.3~0.4)、中度(0.5~0.6)和重度(0.7~0.8)信息贫困，因为在此区间外，0.1~0.2 不足以捕捉贫困的“多维”特征，而 0.9~1 时几乎无信息贫困样本。表 3 显示， k 为 0.3~0.5 时，信息贫困发生率皆超过 50%，指数分别为 0.408、0.377、0.327，表明轻度和中度信息贫困较严重。当 k 增至 0.6 时，发生率骤降至 23.88%，而 k 为 0.8 时，发生率降至 5.64%，指数仅 0.048。虽然重度信息贫困情况相对缓和，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分地区纵向对比，各 k 值下，西部的贫困测量值都高于中部和总体情况， $0.3 \leq k \leq 0.5$ 时，西部的贫困发生率均超过 70%，信息贫困情况突出。跟总体趋势相似， k 为 0.6 起，西部和中部的发生率急剧下降，但西部地区仍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处于重度信息贫困情况。

（三）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为精准把握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的现实情况和构成机理，下文从指标和地区差异视角分解贫困指数。

1. 指标分解

表 4 显示，各指标在不同 k 值下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k 值分别为 0.3、0.5、0.7 用以区分轻度、中度和重度信息贫困，12 个指标的平均贡献率为 8.33%。 k 为 0.3 和 0.5 时，有 5 个指标的贡献率超过了 8.33%，从高至低分别是“网上办理政务能力”“政策机构服务”“政策社群服务”

表 3 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测量结果及分地区情况

| 地区 | 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测量值 | k值 | | | | | |
|----|-------------------|-------|-------|-------|-------|-------|-------|
| |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 全部 | 多维贫困发生率(H , %) | 73.16 | 63.80 | 51.86 | 23.88 | 12.80 | 5.64 |
| | 平均剥夺份额(A) | 0.558 | 0.591 | 0.631 | 0.735 | 0.795 | 0.852 |
| | 多维贫困指数(M_0) | 0.408 | 0.377 | 0.327 | 0.176 | 0.102 | 0.048 |
| 西部 | 多维贫困发生率(H , %) | 88.67 | 82.41 | 71.33 | 36.87 | 20.96 | 10.12 |
| | 平均剥夺份额(A) | 0.596 | 0.616 | 0.647 | 0.743 | 0.801 | 0.855 |
| | 多维贫困指数(M_0) | 0.529 | 0.508 | 0.461 | 0.274 | 0.168 | 0.087 |
| 中部 | 多维贫困发生率(H , %) | 62.97 | 51.58 | 39.08 | 15.35 | 7.44 | 2.69 |
| | 平均剥夺份额(A) | 0.522 | 0.564 | 0.611 | 0.723 | 0.784 | 0.843 |
| | 多维贫困指数(M_0) | 0.329 | 0.291 | 0.239 | 0.111 | 0.058 | 0.023 |

表 4 不同 k 值水平下各指标对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单位：%

| 维度 | 指标 | 不同k值下的贡献率 | | | | | | 均值 | 均值排名 |
|----|----------|-----------|-------|-------|-------|-------|------|-------|------|
| |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 |
| 认知 | 综合类政策认知 | 9.07 | 9.19 | 9.27 | 9.25 | 9.62 | 9.29 | 9.28 | 5 |
| | 生产类政策认知 | 7.57 | 7.65 | 7.81 | 8.48 | 8.76 | 9.12 | 8.23 | 6 |
| | 生活类政策认知 | 7.14 | 7.33 | 7.69 | 8.48 | 9.08 | 8.96 | 8.11 | 7 |
| 能力 | 信息渠道利用能力 | 3.78 | 3.74 | 3.67 | 4.13 | 4.30 | 4.98 | 4.10 | 12 |
| | 信息检索能力 | 6.75 | 6.72 | 6.52 | 6.89 | 6.96 | 7.46 | 6.88 | 9 |
| | 网上办理政务能力 | 12.80 | 12.23 | 11.73 | 10.88 | 10.17 | 9.78 | 11.26 | 1 |
| 服务 | 政策人员服务 | 10.45 | 10.64 | 10.66 | 10.29 | 10.02 | 9.29 | 10.22 | 4 |
| | 政策社群服务 | 11.20 | 11.21 | 11.27 | 10.52 | 10.17 | 9.45 | 10.64 | 3 |
| | 政策机构服务 | 12.33 | 12.02 | 11.53 | 10.43 | 10.02 | 9.62 | 10.99 | 2 |
| 硬件 | 家庭移动设备 | 5.95 | 5.96 | 6.13 | 6.75 | 6.89 | 7.30 | 6.50 | 10 |
| | 家庭网络设施 | 5.36 | 5.60 | 5.84 | 6.07 | 6.03 | 7.13 | 6.01 | 11 |
| | 政策机构规模 | 7.61 | 7.73 | 7.88 | 7.84 | 7.98 | 7.63 | 7.78 | 8 |

“政策人员服务”“综合类政策认知”。 k 为 0.7 时,除了上述 5 个指标外,“生活类政策认知”和“生产类政策认知”的贡献率也超过了 8.33%。维度间比较后发现,服务维度的贡献率更突出,硬件维度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2. 地区分解

表 5 显示,地区贡献率呈现“西高中低”的情况,且西部贡献率始终超过半数。 k 为 0.3 时,地区间贡献率的差值不超过 10%,随着 k 值增加,地区间差距逐渐拉大, k 为 0.7 时,西部的贫困贡献率是中部的近 2 倍,情况更为严峻。

3. 分地区按指标分解

进一步了解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并比较差异。表 6 显示,在西部地区, k 为 0.3 和 0.5 时,“综合类政策认知”“生产类政策认知”“网上办理政务能力”“政策人员服务”“政策社群服务”“政策机构服务”“政策机构规模”这 7 个指标的贫困贡献率超过 8.33%。 k 为 0.7 时,“生活类政策认知”的贡献率也超过 8.33%,而“信息渠道利用能力”在所有 k 值下的贡献率均较低。中部地区, k 为 0.3 时,“网上办理政务能力”“政

策人员服务”“政策社群服务”“政策机构服务”的贡献率超过 8.33%。 k 为 0.5 时,“综合类政策认知”也超过 8.33%。 k 为 0.7 时,“生活类政策认知”的贡献率也超过 8.33%。

地区比较后发现,西部在所有 k 值水平上超过均等值的指标数量多于中部,同一维度横向比较后发现,认知和服务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地区间差异较小,但能力维度在中部的贡献率更突出,硬件维度在西部的贡献率更突出,体现了地区间在贫困特征上的差异。

四、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

前人发现,经济资本^[26]和社会资本^[27]会对农民的信息认知和观念产生影响,此外,信息资本,包括信息重要性感知、信息效果评价和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也有显著效果^[28],缺乏信息资本的农民可能对信息环境的变化更敏感、更难适应,容易受到风险冲击^[29]。因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和信息资本三方面选择自变量,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一并纳入模型,见表 7。其中,经济资本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

表 5 不同 k 值水平下中西部地区对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单位: %

| 地区 | 不同 k 值下的贡献率 | | | | | |
|----|---------------|-------|-------|-------|-------|-------|
|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 西部 | 51.34 | 53.39 | 55.91 | 61.83 | 65.41 | 71.48 |
| 中部 | 48.66 | 46.61 | 44.09 | 38.17 | 34.59 | 28.52 |
| 差值 | 2.67 | 6.78 | 11.82 | 23.66 | 30.83 | 42.95 |

表 6 不同 k 值水平下各指标对不同地区农民政策信息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单位: %

| 维度 | 指标 | 不同 k 值下的贡献率 | | | | | | | |
|----|----------|---------------|-------|-------|-------|-------|-------|----------|----------|
| | | 0.3 | | 0.5 | | 0.7 | | 均值 | |
| | | 西部 | 中部 | 西部 | 中部 | 西部 | 中部 | 西部 | 中部 |
| 认知 | 综合类政策认知 | 9.80 | 8.30 | 9.66 | 8.77 | 9.45 | 9.95 | 9.49(5) | 9.12(5) |
| | 生产类政策认知 | 8.36 | 6.73 | 8.36 | 7.12 | 9.09 | 8.14 | 8.69(7) | 7.64(7) |
| | 生活类政策认知 | 6.99 | 7.29 | 7.44 | 8.00 | 8.85 | 9.50 | 7.94(8) | 8.33(6) |
| 能力 | 信息渠道利用能力 | 2.55 | 5.09 | 2.57 | 5.08 | 2.99 | 6.79 | 2.88(12) | 6.05(10) |
| | 信息检索能力 | 6.19 | 7.33 | 6.31 | 6.79 | 7.06 | 6.79 | 6.70(10) | 7.08(8) |
| | 网上办理政务能力 | 11.66 | 13.99 | 11.31 | 12.25 | 10.05 | 10.41 | 10.82(1) | 11.80(1) |
| 服务 | 政策人员服务 | 10.45 | 10.46 | 10.23 | 11.20 | 10.05 | 9.95 | 10.13(3) | 10.31(4) |
| | 政策社群服务 | 10.26 | 12.18 | 10.36 | 12.42 | 10.05 | 10.41 | 10.08(4) | 11.31(3) |
| | 政策机构服务 | 11.63 | 13.07 | 11.27 | 11.87 | 10.05 | 9.95 | 10.69(2) | 11.37(2) |
| 硬件 | 家庭移动设备 | 6.88 | 4.97 | 7.09 | 4.91 | 7.42 | 5.88 | 7.27(9) | 5.39(12) |
| | 家庭网络设施 | 6.19 | 4.49 | 6.40 | 5.13 | 6.10 | 5.88 | 6.43(11) | 5.43(11) |
| | 政策机构规模 | 9.04 | 6.09 | 9.01 | 6.46 | 8.85 | 6.33 | 8.87(6) | 6.17(9) |

注: 括号内为该指标贡献率的均值在 12 个指标中的排名。

表 7 自变量的基本情况

| 变量维度 | 变量名称 | 操作化定义 | 均值 |
|------|---------|---|--------|
| 个体特征 | 性别 | 女性=0，男性=1 | 0.603 |
| | 婚姻 | 未婚=0，已婚=1 | 0.865 |
| | 年龄 | 受访时实际年龄 | 41.654 |
| | 受教育水平 |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职高=3，大专及以上=4 | 2.403 |
| | 所处地区 | 中部地区=0，西部地区=1 | 0.396 |
| 经济资本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0,3 000]=1, (3 000,6 000]=2, (6 000,9 000]=3, (9 000,12 000]=4, (12 000,15 000]=5, (15 000,+∞)=6 | 2.974 |
| | 家庭主要职业 | 非务农农民=0，务农农民=1 | 0.588 |
| 社会资本 | 现实社会资本 | 非村干部=0，村干部=1 | 0.136 |
| | 网络社会资本 | 微信好友数量, (0,50]=1, (50,100]=2, (100,150]=3, (150,200]=4, (200,+∞)=5 | 2.558 |
| 信息资本 | 信息获取意愿 | 愿意获取各种有用信息的程度，最低=1，最高=5 | 4.332 |
| | 信息消费意愿 | 不愿意为信息投入金钱=0，愿意=1 | 0.450 |
| | 信息理解能力 | 从大量信息中整理关键内容的能力，最低=1，最高=5 | 3.623 |
| | 数字化努力 | 每天上网时间低于1 h 38 min=0，高于=1* | 0.651 |
| | 数字化素养 | 浏览网络新闻、接受网络教育、网络信息共享、网络聊天、网络娱乐、网络购物、网络销售、网络投资炒股八项，能则每项得1分，加总，最低=0，最高=8 | 2.938 |

注：*国家统计局2018年开展的时间利用调查显示，农民互联网使用时间均值为1小时38分/天，问卷调查于2019—2020年开展，故以此为划分标准。

和“家庭主要职业”。社会资本包括“现实社会资本”和“网络社会资本”。信息资本可分为意识和行为两个层面，意识层面，“信息获取意愿”表现为受访者愿意获取有用信息的程度，“信息消费意愿”指购买信息工具及信息本身的意愿。行为层面，“信息理解能力”体现了受访者综合利用信息的水平。时间也是重要变量，上网时间越长意味着可能付出更多“数字化努力”。另外，如果受访者具备更高的“数字化素养”，可能会帮助他们获取更多政策信息。经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政策信息多维贫困加剧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贫困总剥夺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在更多指标上面临信息贫困，贫困程度越深。随后，通过设定 k 值 (0.3、0.5、0.7) 识别样本是否分别处于轻度、中度和重度信息贫困，处于贫困状态记为 1，未处于记为 0，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合这两种模型，能揭示导致信息贫困加深的关键因素及其在不同贫困层次上的差异。

(一) 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程度的影响因素

表 8 为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程度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结果。模型 1 的拟合度为 0.326，个人特征方面，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西部农

民的贫困程度显著更深。经济资本方面，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的变量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 2 加入信息资本意识层面的变量后，拟合度提升了 0.054，信息获取意愿越强烈、更愿为信息投入金钱的农民的信息贫困程度也显著更低。模型 3 加入了行为层面的信息资本变量，模型拟合度较模型 2 提升了 0.073。和前置模型相比，受教育水平不再显著，年龄开始显著，年龄越大信息贫困程度显著越低。经济资本方面，职业变量开始显著，务农农民贫困程度显著更低。其余变量的显著情况与影响方向没有变化。新加入的变量皆有显著影响，信息理解能力越强、付出更多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素养更高的农村居民，信息贫困程度显著更低。

(二) 不同程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

表 9 显示， k 为 0.3 时，个体特征中只有地区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个体更可能面临信息贫困。经济资本中收入提高会带来信息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显著下降，非务农农民更易发生信息贫困。社会资本方面，高现实社会资本者更不易发生信息贫困，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带来可能性的显著下降。信息资本中除数字化努力外，其他变量皆显著，信息获取意愿越迫切、有信息消费

表 8 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程度的影响因素

| 维度 | 变量 | 模型1 | | 模型2 | | 模型3 | |
|------|---------------------|-----------|-------|-----------|-------|-----------|-------|
| | | 系数 | 标准误 | 系数 | 标准误 | 系数 | 标准误 |
| 个体特征 | 男性 ¹ | -0.019 | 0.013 | -0.013 | 0.012 | -0.018 | 0.012 |
| | 已婚 ² | -0.021 | 0.024 | -0.008 | 0.023 | -0.027 | 0.021 |
| | 年龄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2** | 0.001 |
| | 受教育水平 | -0.027*** | 0.008 | -0.023** | 0.008 | -0.012 | 0.007 |
| | 西部地区 ³ | 0.087*** | 0.015 | 0.079*** | 0.015 | 0.056*** | 0.015 |
| 经济资本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0.017*** | 0.004 | -0.014*** | 0.004 | -0.014*** | 0.004 |
| | 务农农民 ⁴ | -0.010 | 0.013 | -0.009 | 0.013 | -0.026* | 0.012 |
| 社会资本 | 村干部 ⁵ | -0.128*** | 0.018 | -0.115*** | 0.017 | -0.113*** | 0.016 |
| | 微信好友数 | -0.032*** | 0.004 | -0.030*** | 0.004 | -0.021*** | 0.004 |
| 信息资本 | 信息获取意愿 | | | -0.044*** | 0.006 | -0.021*** | 0.006 |
| | 愿意信息消费 ⁶ | | | -0.059*** | 0.012 | -0.050*** | 0.012 |
| | 信息理解能力 | | | | | -0.047*** | 0.005 |
| | 高上网时间 ⁷ | | | | | -0.042** | 0.013 |
| | 数字化素养 | | | | | -0.017*** | 0.003 |
| | 常数项 | 0.718*** | 0.039 | 0.906*** | 0.044 | 1.075*** | 0.044 |
| | 样本数 | 896 | | 883 | | 863 | |
| | 模型整体检验 | *** | | *** | | *** | |
| | R方 | 0.326 | | 0.380 | | 0.453 | |

注：①显著性水平：* $P<0.05$ ，** $P<0.01$ ，*** $P<0.001$ (双尾检验)。②1的参考类别为“女性”，2的参考类别为“未婚”，3的参考类别为“中部地区”，4的参考类别为“非务农农民”，5的参考类别为“非村干部”，6的参考类别为“不愿意信息消费”，7的参考类别为“低上网时间”，表9同。

表 9 不同程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

| 维度 | 变量 | 轻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 | | 中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 | | 重度政策信息多维贫困 | |
|------|---------------------|------------|-------|------------|-------|------------|-------|
| | | 几率比 | 标准误 | 几率比 | 标准误 | 几率比 | 标准误 |
| 个体特征 | 男性 ¹ | 1.063 | 0.222 | 0.912 | 0.164 | 0.565* | 0.146 |
| | 已婚 ² | 0.523 | 0.216 | 0.893 | 0.291 | 1.213 | 0.585 |
| | 年龄 | 0.978 | 0.012 | 0.975* | 0.010 | 0.978 | 0.014 |
| | 受教育水平 | 0.794 | 0.101 | 0.873 | 0.092 | 1.046 | 0.158 |
| | 西部地区 ³ | 1.767* | 0.489 | 1.775** | 0.373 | 1.795* | 0.511 |
| 经济资本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0.835** | 0.056 | 0.849** | 0.050 | 0.828* | 0.072 |
| | 务农农民 ⁴ | 0.577** | 0.122 | 0.760 | 0.143 | 0.889 | 0.237 |
| 社会资本 | 村干部 ⁵ | 0.213*** | 0.057 | 0.251*** | 0.076 | 0.217* | 0.164 |
| | 微信好友数 | 0.772*** | 0.052 | 0.745*** | 0.043 | 0.861 | 0.075 |
| 信息资本 | 信息获取意愿 | 0.593** | 0.103 | 0.744** | 0.074 | 0.828 | 0.089 |
| | 愿意信息消费 ⁶ | 0.606* | 0.121 | 0.569*** | 0.097 | 0.608 | 0.155 |
| | 信息理解能力 | 0.539*** | 0.054 | 0.660*** | 0.054 | 0.500*** | 0.059 |
| | 高上网时间 ⁷ | 0.823 | 0.193 | 0.614* | 0.121 | 0.596* | 0.150 |
| | 数字化素养 | 0.883* | 0.050 | 0.916 | 0.044 | 0.716*** | 0.060 |
| | 样本数 | 863 | | 863 | | 863 | |
| | 模型整体检验 | *** | | *** | | *** | |
| | 伪R方 | 0.329 | | 0.260 | | 0.275 | |
| | 对数伪似然 | -336.373 | | -442.645 | | -234.646 | |

意愿、信息理解能力越强、数字化素养越高的受访者，发生轻度信息贫困的概率显著更低。 k 为 0.5 时，年龄和地区的影响显著，年龄越大发生

概率越低。收入有显著影响，职业影响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皆达显著。信息资本方面，除数字化素养外，其他变量的提升对降低中

度信息贫困风险都有积极作用。 k 为0.7时,女性发生重度信息贫困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地区变量继续显著,经济资本方面仅收入的影响显著。社会资本方面,现实社会资本的影响仍然显著,网络社会资本不再显著。信息资本方面,意识层面变量的影响皆不显著,行为层面的变量都有显著影响。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发现,政策信息多维贫困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信息通信设备接入层面的“数字鸿沟”不再是掣肘农民信息脱贫的主要障碍,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政策信息服务及农民办理互联网政务能力上的不足是最明显的短板,确保政策信息服务有效抵达基层是未来工作的关键。同时,群体和地区差异明显,帮扶的人群识别和指标突破要精准。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经济、社会和信息资本因素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机制各异。信息帮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树立多维帮扶理念。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提升信息帮扶效果提供参考。

(二) 政策建议

1. 增强政策信息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让更多人享受数字红利

研究发现,尽管农民的信息能力有所提升,但大多数人仍难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政务服务。作为国家“互联网+农村”规划的关键部分,电子政务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操作培训、简化政务服务流程和提升用户体验来实现。此外,服务维度的高贡献率也启示我们,信息服务的不足可能导致农民在其他维度缺乏支持,陷入信息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加强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提升基层干部的信息服务能力,深化他们对政策信息的理解,并改进政策传播技巧和方法。

2. 政策信息帮扶不能“大水漫灌”,而需“精准滴灌”

政策传播应特别关注年轻农民、农村女性、非务农农民这些群体。年轻农民常因外出务工而错过村组会议,而农村女性则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在政策传播中被边缘化,与务农农民相比,非务农农民接触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较少,社区信息共享不够活跃,获取政策支持也相对困

难。为此,需要通过互联网政务社群和点对点人际传播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信息支持。从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政策信息贫困的脆弱性尤为突出,尽管如今西部地区的经济贫困已得到缓解,但政策信息贫困可能阻碍对农政策有效实施,影响城乡均衡发展,返贫风险仍旧存在,需重点帮扶。提高信息帮扶效率的关键在于解决各地区的薄弱环节,对于西部地区,接下来的重点是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和加强信息机构建设,中部地区则应更侧重于提升农民的信息能力。

3. 针对政策信息贫困程度不同的群体,应采取差异化的帮扶策略

鉴于各因素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本文建议,针对轻度和中度政策信息贫困群体,建议通过积累社会资本和利用互联网社交渠道拓宽信息来源,同时增强他们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激发获取意愿,促进信息更新。而对重度贫困群体,仅对他们进行信息意识层面的帮扶效益不大,他们更多地受到行为层面信息理解能力有限、缺乏上网条件、数字素养不足的影响,这一群体往往也是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教育水平较低,学习能力有限,且因经济条件困顿缺乏足够的闲暇时间。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在信息行为层面赋能外,政府和社会组织还要向他们提供“托底式”政策信息援助,通过人际和组织传播手段消除政策传播的死角,打通政策下乡的“最后一公里”。

[参考文献]

- [1] 彭继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多维贫困动态性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1: 17-18.
- [2]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85-88.
- [3] 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 论权利与剥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1.
-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EB/OL]. (2010-11) [2024-03-02].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0>.
- [5] 相丽玲, 牛丽慧. 基于阿玛蒂亚·森权利方法的信息贫困成因分析[J]. 情报科学, 2016(8): 47. DOI: 10.13833/j.cnki.is.2016.08.009.
- [6] 谢俊贵. 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的信息分化与信息扶贫[J]. 情报科学, 2003(11): 1138. DOI: 10.3969/j.issn.1007-7634.2003.11.005.

- [7] LIEVROUW L A, FARB S E. Information and equity[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03(1): 499.
- [8] HAIDER J, BAWDEN D. Conceptions of “information poverty” in LIS: a discourse analysi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7(4): 534.
- [9] BARJA G, GIGLER B 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how to measure it in the Latin American context[J]. *MPRA Paper*, 2007(1): 1.
- [10] LINGEL J, BOYD D. “Keep it secret, keep it safe”: Information poverty, information norms, and stigma[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5): 981.
- [11] 周向红.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贫困: 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J]. *学海*, 2016(4): 154. DOI: [10.16091/j.cnki.cn32-1308/c.2016.04.023](https://doi.org/10.16091/j.cnki.cn32-1308/c.2016.04.023).
- [12] 胡鞍钢, 童旭光, 诸丹丹. 四类贫困的测量: 以青海省减贫为例(1978-2007)[J]. *湖南社会科学*, 2009(5): 45.
- [13] 刘若熙, 齐丹. 基于灰色关联理想解法的农民信息素养评价模型[J]. *情报探索*, 2016(10): 29. DOI: [10.3969/j.issn.1005-8095.2016.10.00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8095.2016.10.007).
- [14] YU L, ZHOU W, YU B, et al.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rich and poor: Based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as information agent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6(4): 614.
- [15] 刘世洪, 许世卫. 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方法研究[J]. *中国农业科学*, 2008(4): 1012. DOI: [10.3864/j.issn.0578-1752.2008.04.010](https://doi.org/10.3864/j.issn.0578-1752.2008.04.010).
- [16] 金福子, 吴林奕, 刘仕宇.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46. DOI: [10.13320/j.cnki.jauhe.2020.0044](https://doi.org/10.13320/j.cnki.jauhe.2020.0044).
- [17] 刘宇, 杨志萍, 陈漪红, 陆颖. 我国科技信息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与实证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4): 3.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4.001](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4.001).
- [18] 徐勇.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8(1): 116. DOI: [10.16502/j.cnki.11-3404/d.2008.01.027](https://doi.org/10.16502/j.cnki.11-3404/d.2008.01.027).
- [19] 肖滨. 政治学导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231.
- [20] 谢梅, 赵颀. 惠农政策的传播效果评估及策略思考: 以河北省承德市两家乡调查为例[J]. *农村经济*, 2016(7): 22.
- [21] 樊振佳, 程乐天. 可行信息能力: 一个信息分化问题学术概念的构建与阐释[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13): 19.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17.13.003](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17.13.003).
- [22] 国家统计局.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出大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EB/OL]. (2019-08-07)[2024-03-02].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7_1689636.html, 2019-8-7.
- [23] 郑素侠, 宋杨. 空间视野下我国信息贫困的分布特征与政策启示[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7): 21. DOI: [10.3969/j.issn.1007-8770.2019.07.00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8770.2019.07.004).
- [24]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7-8): 476.
- [25] 张全红, 周强.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 1991—2011[J]. *财贸研究*, 2015(6): 22. DOI: [10.19337/j.cnki.34-1093/f.2015.06.004](https://doi.org/10.19337/j.cnki.34-1093/f.2015.06.004).
- [26] HE J, LI O, CAI M.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Rural Information Poverty in Guizhou[C].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Pairs: Atlantis Press, 2015: 110-114.
- [27] 朱庆莹, 陈银蓉, 胡伟艳, 等. 社会资本、耕地价值认知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 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11): 120. DOI: [10.12062/cpre.20190513](https://doi.org/10.12062/cpre.20190513).
- [28] 司瑞石, 陆迁, 谭永凤. 信息资本对农户水土流失治理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黄土高原区1048户农户的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11): 41. DOI: [10.13448/j.cnki.jalre.2018.331](https://doi.org/10.13448/j.cnki.jalre.2018.331).
- [29] 刘博. 农民信息贫困的“脆弱性”研究: 黑龙江农村地区信息需求与消费状态调查[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7(2): 5. DOI: [10.14064/j.cnki.issn1005-8214.2017.02.002](https://doi.org/10.14064/j.cnki.issn1005-8214.2017.02.002).